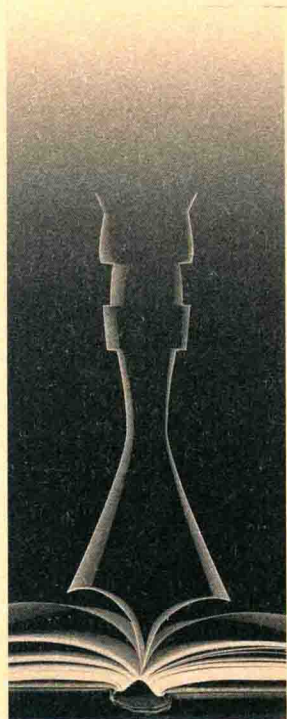


教科书研究丛书

丛书主编 石鸥

百年中国教科书论

石鸥 著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百年中国教科书论

石鸥 著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百年中国教科书论 / 石鸥著.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11

ISBN 978-7-5648-1398-7

I. ①百… II. ①石… III. ①教材—编写—史料—中国 IV. ①G42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39374号



教科书研究丛书

丛书主编 石鸥

百年中国教科书论

石鸥 著

策划组稿 | 赵亚梅

责任编辑 | 赵亚梅 何峰

设计制作 | 周基东设计工作室

责任校对 | 黄莉

出版发行 |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址: 长沙市岳麓山 邮编: 410081

电话: 0731. 88853867 88872751

传真: 0731. 88872636

网址: www.hunnu.edu.cn/press

经 销 |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 长沙市精美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 mm×1092 mm 1/16

印 张 | 16 插页10

字 数 | 287千

版 次 | 2013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648-1398-7

定 价 | 48.00元

【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转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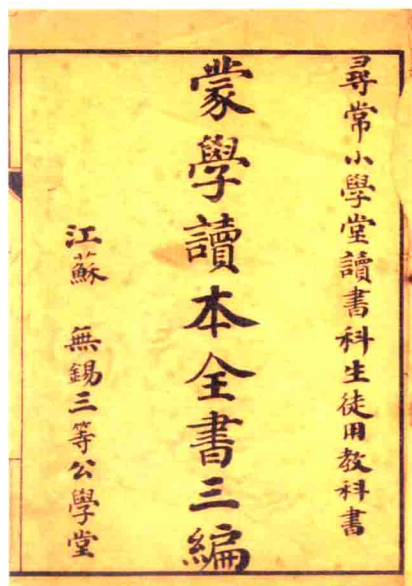
▲天文启蒙，上海广学会，18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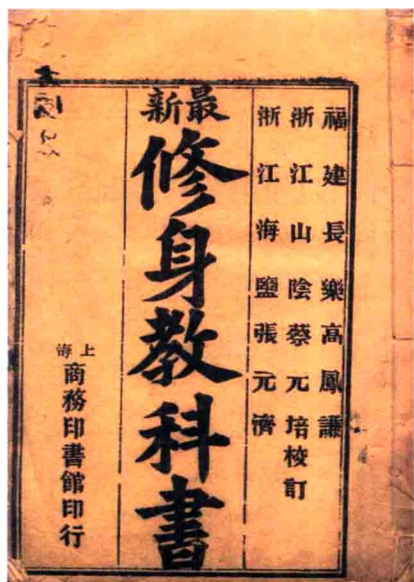
▲气学须知，上海格致书室，18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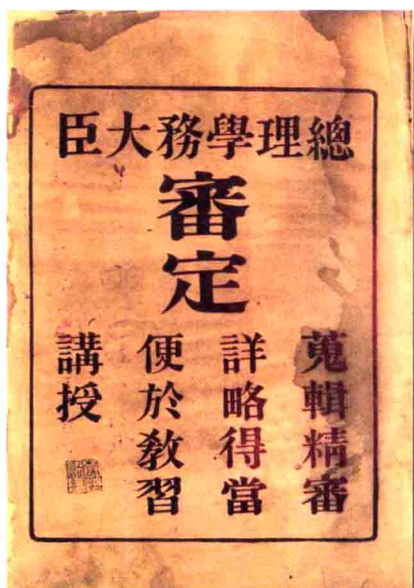
▲蒙学课本，上海商务印书馆代印，1899



▲蒙学读本全书三编，无锡三等公学堂，19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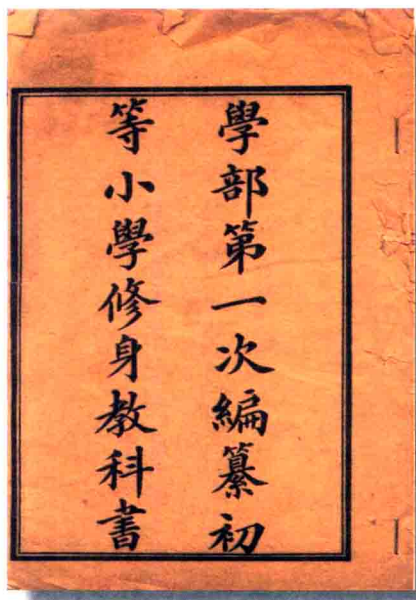
▲最新教科書系列，上海商務印書館，19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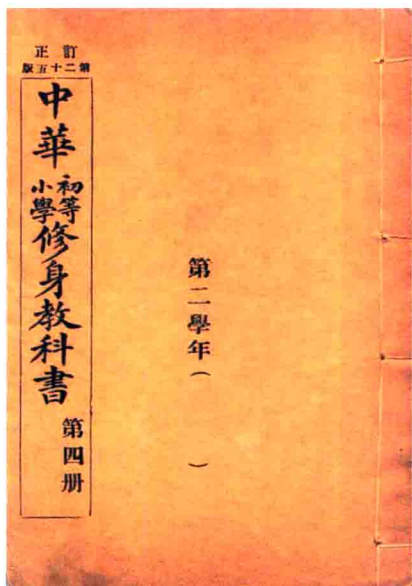
▲《瀛环全志》审定批词，商务印书馆，1903



▲最新初等小學國文教科書，彪蒙書室，1904



▲学部第一次编撰教科书系列，1906



▲中华初等小学修身教科书，中华书局，19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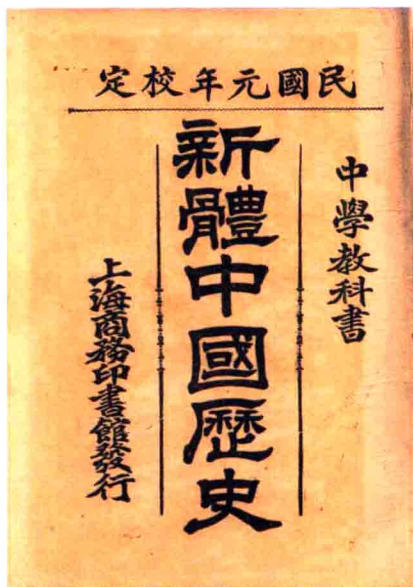
▲新式理科教科书，中华书局，1916



▲ 共和国教科书系列，商务印书馆，1912



▲ 共和国教科书插图，商务印书馆，1912



▲新体中国历史，商务印书馆，1912



▲实用主义动物学教科书，科学会编译部，1918



▲订正中学修身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14



▲开明国语课本，开明书店，1934



▲国防国语课本，山东省胶东国防教育委员会，1938



▲新时代党义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29



▲算术课本，新华书店，1946



▲历史课本，太岳新华书店，19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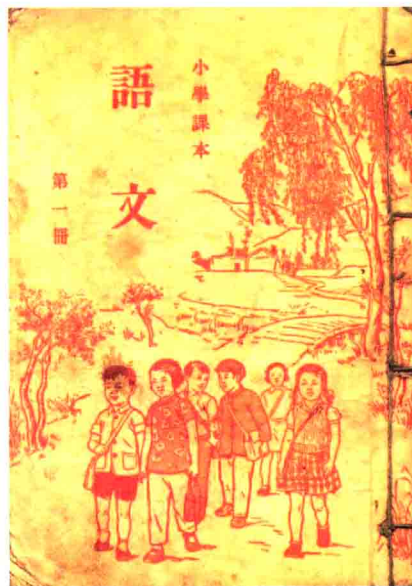
▲国语课本，新华书店，1950



▲政治课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1



▲社会常识，东北人民出版社，1952



▲语文，人民教育出版社，1952



008

教科
书
研
究
丛
书



▲文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55



▲英语，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60



▲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天津延安中学，1968



▲革命文艺，长沙市革命委员会政治部文教组，1968



▲工农兵知识, 佛山专区中学教材编写组, 1968



▲政治语文,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70



▲公民,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0



▲数学,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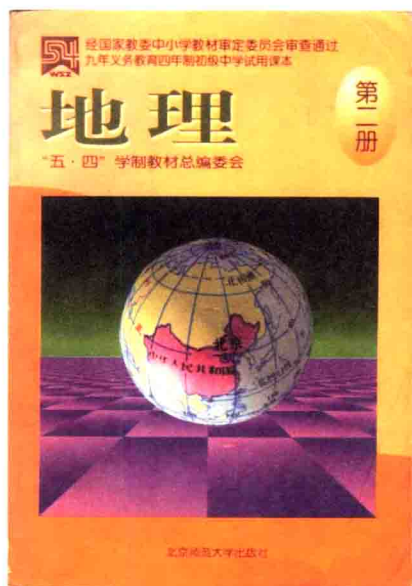


010

教科
书
研
究
丛
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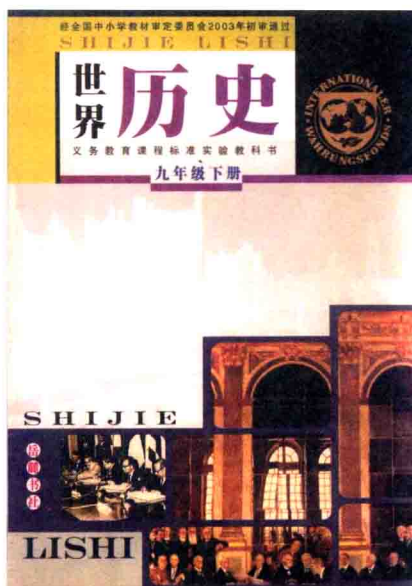
▲自然, 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4



▲地理,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语文,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2



▲世界历史, 岳麓书社, 2004



序

与高头讲章、学术典籍相比，孩童们手捧的小课本似乎是最微不足道的了；与研究国家的宏观教育战略及纯学理体系的构建相比，对这些小课本的研究似乎也是最微不足道的了。

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一切学术精华与思想光芒，只有被一代代年轻人吸收同化进而创新，才有可能学术长存，思想长春，而要让它们成为年轻人成长的营养，需要化为简单浅显的内容溶入课本，从而才可能融于心灵。一切教育战略的实施和各种教育学派的主张，最终必须进入学校，进入课堂才有价值与意义，而进入学校、进入课堂的途径主要是这些小课本。任课程理念多么先进，任教育思想多么进步，唯有转化为课本才可能起应有作用。任人的全面发展的目的如何清晰，任民族素养的提升需求多么急迫，也唯有借助课本才能得以不同程度的实现。

历史地看，中国自洋务运动一百多年来，从西式教科书的引进，到学堂自编教科书发轫，从书坊教科书之兴盛，到官编教科书的出现，从通用教科书的一统，到教科书的百花齐放，小小课本开民智启民德，传承着民族的光荣与梦想，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撒播着现代文明之光，它们启迪心灵，形塑国民，激荡着中国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特别是 20 世纪的前半个世纪，在“盗贼夜行，军阀逐鹿的民国年间，多处乡镇仍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为什么？纵然是兵荒马乱，却有人心淡定。这又为什么？有人说，这因为上有信念、下有常识，而集二者于一身的乃小小课本；这因为“民间社会的许多路口站着有严肃的先生、学童，手中握着课本”（邓康延语）。这就是教科书的力量。

曲折微妙的是，在中国文化下，教科书开创并主导中小学的局



面在 20 世纪后半半个世纪愈加真实、持久并且极端，功利化色彩日益浓厚。教师的优劣以学生对教科书的掌握为标准，教育的质量以考核学生掌握教科书的情况为依据，家长对孩子的督促也是手捧着教科书来检验。我国的文化传统导致了学校课堂上教师教的是教科书，学生学的是教科书，考试考的是教科书——从古至今，从古代科举到现代学校概莫能外。教科书在我国中小学几乎就是教育的圣经。中小学的课堂文化几乎就是教科书的文化。我曾经说过，一定程度上指挥中国中小学教育的不是教育部，而是编撰教科书的那些人。他们指挥着学生学习什么接受什么，他们告诉学生认同什么否定什么。他们让整个中小学课堂随教科书的定调起舞。

遗憾的是，长时期里，对于这些小小的于个人于民族都意义非凡的教科书，我们的学术界特别是经典学院派的学术几乎对其不屑一顾。这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新中国以后著名学者亲自实质性操持教科书的现象越来越少，二是对教科书的真正研究非常匮乏。课本圈（姑且这么称谓）往往是自说自话，基层实践工作者看重教科书的教与学，教科书提供者看重课本的编撰与发行，唯独缺乏极为重要的对教科书的批评或评论。最重要的文本，竟然缺乏最需要的关注。

教科书如此重要，而我们却无法科学回答教科书中究竟是否应该编入金庸的武侠小说，是否可以删掉《狼牙山五壮士》；面对充满争议的鲁迅的作品哪些以及多少甚至是否应该进入教科书，我们莫衷一是；对教科书究竟是否应该或如何体现国家意志，当国家意志与客观真理冲突时教科书应如何处置等问题，我们充满困惑；对教科书如何体现特色，教科书发展进程中统一与多样、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之间如何权衡人们普遍不解……无法回答是因为缺乏研究，莫衷一是也是因为缺乏研究，充满困惑还是因为缺乏研究，普遍不解更是因为缺乏研究。

别无解决之途，唯有加强研究。我们太需要研究了，需要教科书批评或评论。

此时，俯看自身，回望历史，廓清历史就是一种研究。19 世纪下半叶始，有了新式学堂，也有了新式教科书。一百年来，中国的教科书发展走出了一条值得大书特书之路，这条道路之艰辛、之曲折、之困顿，需要梳理，需要总结，更需要反思。以史为鉴，可知兴替。我们提出，清末民初教科书发展有一个绝无仅有的黄金时期，那么，这与紧接着的人才辈出、群星璀璨的局面有没有必然的联系？大事件、大人物、大著作、大思想固然重要，小课本引进新思想、新行为、新价



价值观的作用也不能轻视。它们为大人物的新思想、为大事件带来的大变革，提供了思想基础和觉醒的民众基础——清末民初的海量教科书掀起了中国历史上最草根的一次重要的民主政治启蒙、现代伦理启蒙、科学文明启蒙运动，这场启蒙运动自下而上展开，为推进中国的近现代化进程做出了贡献。在一定意义上，辛亥革命的枪炮声之所以相对比较容易攻破延续千百年的封建皇朝，是由于这场启蒙；五四运动民主与科学的理念之所以很快就成为广大学生积极追求的理想，胡适、鲁迅、陈独秀的思想之所以被广大青年普遍认同，都由于这场启蒙。

教科书研究不仅仅要回望过去，更重要的是检视当下，启迪未来。今日，当我们痛陈教科书问题多多，批判教科书远离儿童，脱离生活之时，我们能否从那些历史久远的教科书和已经成为过去的早期教科书制度中获得些许启示？为什么百年前鲜活的教科书至今天成为教条、说教、枯燥、死气沉沉的代名词？当年张之洞、蔡元培、胡适、陈独秀、章士钊、冯友兰、吕思勉、顾颉刚、林语堂、竺可桢、严济慈、丁文江、刘海粟等亲自甚至独立编撰教科书的局面何时才能再现？是否值得呼唤再现？确实，历史与现实有着惊人的统一，一百年后，我们仍然要不停地追问：中小学教科书如何体现科学、民主、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与追求？如何利用教科书这一最大读者群的文本对未成年人进行有效思想引领？如何通过教科书给广大青少年儿童以及他们的家长带来更多的正能量？这些一脉相承的现实问题，我们也许可以从历史这面镜子中得以昭示和折射。

教科书研究还要探寻本真。历史永远纷繁复杂，现实总是变幻莫测，这尤其需要加强对教科书本真问题的探究。比如：教科书有哪些构成要素，教科书的基本特征是什么，教科书的质量标准和评价体系是什么样的，如何编写既体现一般文化要求和知识水准、又能够满足不同发展水平的学生需要的教科书，社会（国家）、学科、学生三要素在教科书编写中的地位与价值，教科书选择内容的依据以及教科书内容的更新和改编，教科书的竞争、选用和淘汰制度等主题的研究。

该套丛书即是由我领衔的教科书研究团队在教科研究的上述方面所做的些许努力和尝试。这些研究风格不一，主题不一，但都是围绕教科书而展开的。既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既有学科的也有制度的。它们或从教科书历史维度来展开，如对清末民国、对新中国十七年等不同历史时期的教科书的历时性、阶段性研究；或从现实角度展开研究，如教科书内容取舍过程中的各种权力博弈，教科书对思



想的形塑和规训等；或围绕学科教科书展开研究，如对英语、对体育、对思想品德等教科书的梳理与研究；或从制度维度来研究，如教科书的审定。但都试图通过实物澄清史实，通过历史昭示现实，通过各个点的深挖来实现面的通透，通过教科书的外在表现来把握其深层实质，通过教科书这面镜子来透视教育发展、折射孩子们的成长。其中有些研究即便粗糙，应该说还是填补空白的；有些研究的结论即便还值得商榷，但某些方面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比如对清末民国教科书的审定制度研究，其文献梳理工作相当扎实，至少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比较可靠的文献基础。所有研究都体现了一个突出特点，即大量占有教科书实物。我们主张，在教科书研究上，不读课本不动笔，至少慎动笔，犹如文学评论要读文学作品、电影评论要看电影一样。我很庆幸，研究教科书我们有一种天然优势，这就是大量占有历代教科书。

该套丛书与其说是某个人的研究成就，不如说是我们教科书研究团队集体智慧的结晶；与其说是教科书研究团队近年的研究成绩，不如说是十多年潜心搜集、整理、分类、研究的成果积累（其中多数是毕业多年的博士对自己论文的修改稿）；与其说是研究的结果展示，不如说是我们团队有关教科书研究的新的、深度的开始。

该套丛书的出版首先要感谢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没有周玉波先生、陈宏平先生的眼光与气度，没有李培超先生、黄林先生、何海龙先生、曹爱莲女士的认真审读以及各种宝贵意见，没有赵亚梅女士的策划组稿及文字加工等辛勤劳动，就不可能有这套书的面世，由衷地谢谢各位。说真的，我欣赏并信赖用心在做我们的书的出版社。

该套丛书的出版还要感谢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感谢孟繁华教授，感谢宁虹、康丽颖、蔡春、张增田教授，感谢关心我的各位同事。感谢你们为我的研究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平台。

本丛书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二五”规划2012年度教育学课题“百年中国教科书在文化传承与创新中的基础作用”（BAA120011）阶段性成果。

石鸥

于首都师范大学 学堂书斋

2013年8月25日